

走向成熟的经验研究*

——写于《社会学研究》创刊三十周年

李路路 朱 斌 李才香

提要:本文以《社会学研究》创刊三十年以来所发表的论文为基础,对我国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发展进行了系统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经验研究逐渐成为社会学研究中的主流形式,并具有研究方法多元化、研究形式规范化、作者队伍专业化的趋势。接着作者进一步梳理了“组织与治理”、“分层与流动”、“家庭与生活”三大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指出这些研究始终贯穿着现代化理论与“国家—社会”理论两大理论线索,以及“制度/结构”与“行动/过程”两种分析框架。最后,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讨论了目前社会学经验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突出表现为研究内容的内卷化以及研究理论的碎片化。

关键词:经验研究 规范化 专业化 内卷化 碎片化

2016年是《社会学研究》创刊三十周年。作为中国社会学最具专业影响力的学术刊物,《社会学研究》在呈现最新研究成果、提升研究水平、引领研究趋势、培养专业人才特别是中青年社会学家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藉此机会,应《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之邀,我们以《社会学研究》为基础,对三十年来的经验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以此向《社会学研究》创刊三十周年表示祝贺。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对于经验研究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从广义上理解,经验研究不仅包括利用第一手经验资料进行的研究,也包括那些运用二手经验资料,通过内容分析、定性分析、文献分析等方法考察实际社会问题的研究。按照研究方法的不同性质,也是最常用的分类,可将经验研究分为统计调查、实地研究、文献研究和实验研究四大类。由于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实验研究的成果非常少,本文把实验研究、混合研究和研究方法不明确但使用经验材料的研究合并为其他研究进行统计。

* 如有问题,请联系通讯作者朱斌(zhubin2015@ruc.edu.cn)。文责自负。

经验研究或实证研究是近代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社会学的基本特征,三十年来形成了大量成果,因而对其进行评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本文的评述仅是一个尝试。

一、三十年经验研究的基本状况

我们对自1986年《社会学研究》创刊以来到2015年为止所发表的经验研究论文进行了逐条统计,主要变量包括:发表时间、论文要素、研究方法、作者情况。通过这一全覆盖的统计,可以看到三十年来经验研究形式上的变化和特征。

(一) 经验研究越来越成为主流的研究方式

《社会学研究》创刊三十年来发表论文总数为2181篇,其中经验研究论文数量达到960篇,占总体的44.0%。^① 如果以每十年为一个时段进行分析,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见表1):经验研究论文在所发表论文中的比例近十年来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从第一个十年的(1986-1995年)33.7%,经过第二个十年(1996-2005年)的41.8%,在第三个十年达到了61.7%。从整体上来说,经验研究在数量和规模上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尤其是2006-2015年这十年间实现了快速发展。

表1 三十年来经验研究论文数量的变化

时间段	1986-1995年	1996-2005年	2006-2015年	合计
经验研究论文数	305	277	378	960
论文总数	906	662	613	2181
所占比例(%)	33.7	41.8	61.7	44.0

注:如无特别注明,本文中所有统计数据均来自于对三十年来的《社会学研究》的统计。

^① 对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中的论文总数进行统计的时候,主要依据中国知网的期刊高级检索中出现的目录条数,其中删除了学术动态、会议通告、年会学术综述、工作纪要、部门简介、个人讲话、文献综述、书评、对话等条目,只对研究性论文的数量进行了统计。如果我们保留综述类、书评类、对话类文章的话,论文总数为2460篇,经验研究论文所占比例为39.0%。

(二) 不同经验研究类型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从表2中可以看出,三十年来,统计调查基本稳定,仍然是传统主导的经验研究类型。实地研究的规模迅速扩大,文献研究回升,但其他经验研究类型出现减少的趋势。

1. 统计调查

在960篇的经验研究论文总数中,统计调查类型的论文数量和比例都是最高的,但分不同时段来看,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即统计调查论文在论文总数中的比例逐年下降,一枝独秀的局面正在改变。统计调查成果的主导地位和其他经验研究类型的发展,显示出经验研究越来越多元化的趋势,这是经验研究走向成熟的表现之一。

2. 实地研究

实地研究在这三十年发展非常迅速,在第一个十年实地研究的比例不过10%左右,而到1996年以后就迅速攀升到35%以上。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变化。我们的估计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和改革开放的急剧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通过实地研究可以更深入、更深刻的理解中国的变化以及背后的内在机制,其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统计调查在社会学研究研究中的地位。这也是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走向成熟的表现之一。

3. 文献研究

与上述两种经验研究方式相比较,文献研究的数量和规模呈总体下降、近十年略有回升的趋势。在我们看来,造成这种波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文献研究的质量和规范性正在经历一个转型,较之于前十年大量不甚规范的文献研究,第二个十年间文献研究逐渐走向规范化,甚至经历了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例如对史料的分析、对媒介的分析等等。而作为一个本来我们就不甚熟悉的类型来说,相对于统计调查和实地研究,文献研究的“陡降”也许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第二,文献研究的变化与历史研究的变化密切相关,第一个十年有大量研究论及历史中的社会现象,但这些研究在第二个十年有所减少,而近年来随着历史社会学的兴起,文献研究比例有逐渐增加。相较于统计调查和实地研究,在瞬息万变的当代中国社会,对文献资料的纵贯分析显得尤其重要。没有“历史感”,“经验感”和“实践感”就难以延展(肖瑛,2014)。

4. 其他类型

本文把实验研究、混合研究和研究方法不明确但是使用经验材料

的研究合并为其他研究进行统计。实验研究很少,三十年中仅有5篇。混合研究主要是指在研究方法上同时使用了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研究,数量不多,且近十年大幅减少。

表2 30年来经验研究不同研究类型的变化

研究类型	所占比例	时间段			合计
		1986 - 1995 年	1996 - 2005 年	2006 - 2015 年	
统计调查	论文数量	169	136	175	480
	该时间段比例(%)	55.4	49.1	46.3	
	总论文数比例(%)	17.6	14.2	18.2	50.0
实地研究	论文数量	33	99	139	271
	该时间段比例(%)	10.8	35.7	36.8	
	总论文数比例(%)	3.4	10.3	14.5	28.2
文献研究	论文数量	80	27	46	153
	该时间段比例(%)	26.2	9.7	12.2	
	总论文数比例(%)	8.3	2.8	4.8	15.9
其他类型	论文数量	23	15	18	56
	该时间段比例(%)	7.5	5.4	4.8	
	总论文数比例(%)	2.4	1.6	1.9	5.8
合计	论文数量	305	277	378	960
	总论文数比例(%)	31.8	28.9	39.4	100

(三) 经验研究三十年来的规范性越来越高

本文评估经验研究规范性的指标是在研究中是否有对研究方法的介绍。从整体来说,三十年来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960篇经验研究论文中,有研究方法介绍的为620篇,占总体的比例为64.6%。应该说在编辑部和学界的共同努力下,研究论文的规范性在近二十年得到了迅速提升(见表3)。

分类型来看,实验研究的规范性最强,有明确研究方法介绍的比例达到100%,严格介绍了自变量与因变量、前测与后测、实验组与控制组等实验要素;其次是统计调查研究的规范性论及比例达到83.3%,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已经形成了比较标准的介绍方法,包括数据、变量、模型等的说明;实地研究的规范性尚有待加强,有方法介绍的论文所占比例为57.9%;目前规范化比例最低的是文献研究,仅为12.4%,文献

研究中应该介绍的资料来源、归类、编码、文本分析等所用方法,在论文中都很少提及,这可能与文献研究本身在中国不发达有关。

表3 三十年来经验研究中包含有研究方法介绍的状况

论文类型	所占比例	时间段			合计
		1986 - 1995 年	1996 - 2005 年	2006 - 2015 年	
有研究方法介绍	论文数量	136	210	274	620
	占经验研究比例(%)	44.6	75.8	72.5	

(四) 经验研究作者队伍的专业素养越来越高(见表4)

分析作者的来源是考察学科专业性的重要指标。作者专业性水平的提升会促进提升学科的专业性水平。对于作者来源的分析表明,以《社会学研究》为代表的学术期刊,已经偏重于从受过系统训练的专业部门的研究者中选取优秀论文,这是我国社会学制度化与专业化的一个重要表现。第一,来自大陆高等院校内、受过系统社会学专业研究训练的作者的论文数量和比例每十年都有大幅提升。^① 第二,相反,作者来源为政府部门的经验研究越来越少,从第一个十年的14.1%下降到近十年的零。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新起步的年代,这类作者及其成果曾经对推进中国社会学,特别是推进经验研究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一些非常重要的学术成果来自于当时的政府工作人员所进行的研究工作。^② 第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来自社会科学院系统的作者数量有所下降,虽然仍然是仅次于大陆高等院校的重要作者来源机构,但是,无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是地方省市社科院,在《社会学研究》中发表论文的数量都明显减少了,特别是地方社科院更是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内的社科院系统工作重点发生了转向,在高水平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已经不是他们最重要的选择,但这不等于他们的研究工作包括经验研究的质量和数量在下降。第四,作者来源日益多元化。纵观创刊30周年的《社会学研究》,可以看出她已经吸引了众多的境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作者投稿,使得经验研究更加国际化,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研究内容更加充实。

① 为了便于统计和分析,我们在对作者来源进行统计的时候,仅统计了论文的第一作者的第一单位。

② 例如,当时国家计委工作人员路风发表的单位制的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

表4 三十年来经验研究作者来源情况

作者单位	所占比例	时间段			合计
		1986 - 1995 年	1996 - 2005 年	2006 - 2015 年	
大陆高等 院校	论文数量	103	160	296	559
	该时间段比例(%)	33.8	57.8	78.3	
	总论文数比例(%)	10.7	16.7	30.8	58.2
社科院类	论文数量	136	66	45	247
	该时间段比例(%)	44.6	23.8	11.9	
	总论文数比例(%)	14.1	6.9	4.6	25.8
大陆外高校 及研究机构	论文数量	13	37	32	82
	该时间段比例(%)	4.3	13.4	8.5	
	总论文数比例(%)	1.4	3.9	3.3	8.5
政府及其他	论文数量	53	14	5	19
	该时间段比例(%)	17.4	5.0	1.3	
	总论文数比例(%)	5.5	1.4	.5	2.0
合计	论文数量	305	277	378	960
	总论文数比例(%)	31.8	28.9	39.4	100.0

二、经验研究的内容分析

三十年来,经验研究的内容几乎囊括了社会学所有的分支领域,研究者所应用的理论也纷繁复杂。但在本文作者看来,有两条理论主线始终贯穿于其中,即“现代化理论”与“国家—社会”理论。首先,近百年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变化不居的状态,那么与古典社会学家相似,社会变迁与社会秩序、社会发展的关系同样成为了中国社会学者们所思考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经典回答来自于现代化理论及其反对者,双方争论的核心在于经济技术理性在整个社会的弥漫是否会决定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动乃至社会价值观的改变。其次,如果说现代化进程是中西方相一致的历史发展过程,那么“国家—社会”关系则是中国区别于西方的结构框架。“国家—社会”理论事实上是由极权主义、法团主义、多元主义、市民社会等一系列理论组成,他们的区别在于“国家—社会”相对关系的判断。中国学者尤为关心的是,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释放出多少原来被国家吸纳或者控制的社会(包

括市场)力量,这些力量又是如何形塑社会关系与行动的。

从实际分析的层次上来看,近三十年的经验研究主要循着两种分析框架展开。一种是“制度/结构”分析框架,该框架认为:一方面,社会结构或制度安排的关系及其变迁是社会秩序与社会变迁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结构或制度因素是影响组织、群体与个人行动的决定性因素。另一种是“行动/过程”框架,认为组织、群体或者行动者不完全受制于结构因素,而是拥有相当的能动性,故而只有在具体行动、事件、过程中才能把握社会秩序与社会发展的形成机制。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呼吁“返回历史视野”(渠敬东,2015),希望通过历史脉络的梳理来理解古今之间的“本”与“变”,这种努力可以看作是第三种分析框架——“历史/脉络”分析框架的雏形,不过该框架能否进一步发展还有待更多学者的参与。

受篇幅和能力所限,本文难以全面梳理所有的经验研究成果,我们选择了三个领域,即“组织与治理”、“分层与流动”、“家庭与生活”,对其经验研究的内容做了进一步的分析。选择这三个领域主要是考虑到相关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并不意味着其他研究成果不重要。

(一)组织与治理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围绕组织与治理的经验研究就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中的主流领域之一。考虑到国家在我国社会秩序与变迁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这些研究基本是围绕政府展开的。一方面是政府内部权力(主要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制度安排与实际运作;另一方面则是政府与市场、社会的互动关系,包括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社会抗争等方面。

1. 国家治理体制与内部关系

总的来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关系始终沿着“集权—分权”而变化。一方面,集权可以避免地方政府形成“诸侯割据”,也方便中央政府随时纠正地方政府的行为偏离(曹正汉等,2014);另一方面,地方分权却可以提高治理效率,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可以分散和转移社会风险,维护政权稳定(曹正汉、周杰,2013)。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典型地体现在财政权和行政权(或者说人事权)的制度安排上,通过考察财政制度与行政制度的变化,许多研究显示,中国的央地关系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出集权化趋势(周飞舟,2006a;王汉生、王一鹤,2009;

渠敬东等,2009),但这种趋势导致基层政权维持社会秩序与促进社会发展的能力大大下降,最终促使“项目制”成为治国理政的常规治理方式(李芝兰、吴理财,2005;周飞舟,2006b;陈家建,2013)。

中央或者上级政府希望通过制度安排使得基层政府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并不意味着基层政府行为不具有自主性。大量研究发现,基层政府尤其是县、乡镇政府普遍存在偏离甚至违背制度安排的非正式行为。而这些非正式行为产生的基础恰恰在于政府组织的制度安排。有研究者把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关系的特点决定了由此产生非正式行为是必然的(周雪光、练宏,2012)。更为重要的是,委托—代理关系一旦涉及到多个代理者,如一项政策涉及到多个部门时,那么委托—代理问题可能更为突出(陈家建等,2013)。从实际的政治过程来看,地方政府的非正式行为形式多样,而且贯穿于目标管理责任制的各个阶段(周雪光,2008;周雪光、艾云,2010;折晓叶、陈婴婴,2011;狄金华,2015)。不过,对于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而言,他们也可以通过运动式治理,靠硬化预算、强化监督来敦促地方政府保质保量完成特定政策。

2. (地方)政府与经济发展

早期的经验研究大多仅仅在经验层面上对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没有提炼出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解释。后继的相关研究对内生机制等问题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许多研究强调了地方经济发展对增强地方自主性的作用(熊万胜,2010),同时对于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乃至寻租也有着积极影响(周飞舟,2009;耿曙、陈玮,2015)。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垄断了大量地方性资源,如土地、资本、能源等,由此也形成了很强的投资能力(刘长喜等,2014),从而能够塑造经济市场环境和产业生态(刘成斌,2014;冯猛,2014),或者直接影响企业的结构、战略与绩效(杨典,2011)。

自经济改革以来,虽然地方政府始终有动力和能力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但发展经济的策略则随着分税制改革和企业改制发生了变化。在企业改制之前,乡镇企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乡镇企业的集体产权“其实是社区内一份隐性的、非正式的‘社会性合约’”(曹正汉,2008),其产权主体通常难以界定(折晓叶、陈婴婴,2005),那么乡镇政府作为部分产权主体就可以分享乡镇企业发展带来的收益,因此乡镇政府会积极经营乡镇企业(具体参见周雪光、赵伟,2009)。但企

业改制之后,乡镇政府不得不从原来的经营企业逐渐转向经营地区经济(曹正汉、史晋川,2009),典型体现为城市化建设中的土地财政(周飞舟,2007)。

在企业改制之后,私营企业的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相对于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并不总能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但私营企业的发展却不弱于前者,对此的一个主要解释在于私营企业获得了社会力量的重要支持。这种社会力量既来自于传统家族网络(朱秋霞,1998),也来自于企业之间正式与非正式的组织网络,如产业群网络、行业协会、合会等(李培林、梁栋,2003),还有就是企业主本身所发展的私人关系网络(边燕杰、张磊,2006;符平,2011)。近年来的研究开始进一步注意到,企业所嵌入的社会网络并不一定会带来收益,在不同制度环境、不同发展阶段甚至可能带来更高成本和风险(吴宝等,2011;李路路、朱斌,2014)。

总的来看,在市场环境并不完善、企业组织本身还未现代化的情况下,已有的社会学经验研究更多关注政治与社会力量对于经济秩序与发展的驱动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我们可能也需要重视市场环境与企业组织本身的变化带来的影响,从而使得社会学研究成果不仅能与西方社会学对话,还要能与经济学研究对话。

3. 国家(政府)与社会治理

在计划经济时期以及改革初期,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农村中的人民公社和城市中的“单位”进行治理。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人民公社与“单位”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刘平等,2008),二者都逐渐丧失了社会治理基本单元的性质,因此,农村和城市基层治理的重建,成为了社会学经验研究关注的热点。

在农村,村委会成为新的基层治理组织,因此村委会选举是观察基层权力结构以及各种行动主体互动关系的核心事件。首先,分税制改革以后,国家权力在农村中逐渐衰退(邱泽奇,1999),一个重要表现在于乡镇政府在农村选举中更倾向于中立角色(周雪光,2009)。其次,农村精英依然主导着乡村治理(董磊明,2002),只不过农村精英的形成越来越依赖于农村社会尤其是家族的支持(孙秀林,2008)。最后,村庄内部经济发展与社会资本培育对农民参与选举具有重要影响(孙秀林,2008)。

在城市中,由于社区成为了基层自治的重要载体,那么居委会与业

主委员会的权力关系则是焦点。大多数研究都认为,国家仍然通过各种渠道参与甚至控制城市社区治理。首先,国家不鼓励居民在居委会组织网络以外进行自主性的利益表达(杨敏,2007),而且由于行政权力主体占有资源优势,故而在与其他权力主体互动过程中始终占据主动(耿敬、姚华,2011)。其次,社区居民有时也会主动要求国家参与社区治理,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社会组织的自治空间和行动资源通常是有限的,故而需要国家援助(王汉生、吴莹,2011);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内部本身也存在利益群体分化(石发勇,2010),他们之间出现冲突时往往都会寻求国家支持(王星,2012)。

除了基层治理方式在变化,公共福利的提供方式也在改革过程中有所改变,政府将不再通过人民公社或者单位间接提供,而是直接提供给所有社会成员,这对于基层政府的管理水平和财政收入是个很大的挑战。与此同时,基层政权尤其是乡镇政府却因为税费改革而出现了财政“空壳化”(周飞舟,2006b),进一步使其提供公共福利的能力大大下降(李芝兰、吴理财,2005)。当基层政府难以提供更多公共物品和服务时,社会组织可以弥补这一方面的缺失,这直接促成了社会组织尤其是 NGO 研究近年来的兴起。社会组织提供公共福利的能力与其组织自主性密切相关,包括政治结构自主性与行动策略自主性,二者常常相互交织(黄晓春、嵇欣,2014)。从目前研究来看,影响中国社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因素仍然是制度环境。许多研究都发现,国家对于社会组织的控制是一种分类控制体系,也就是说,政府会根据自己与社会组织的利益契合度采取不同控制策略(江华等,2011)。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之下,社会组织的行动自主性取决于组织自身特点,如组织资源、组织领导人、组织凝聚力等等(邓燕华、阮横俯,2008)。除此以外,社会组织也能够通过非正式政治,或者利用不同政府部门多重治理逻辑交错产生的运作空间来提高自己的行动自主性(黄晓春、嵇欣,2014)。

4. 社会抗争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秩序受到挑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社会抗争。已有的关于社会抗争的研究大体上围绕着三类抗争群体:农民、工人与中产阶级,而研究的主题集中于社会抗争的发生和发展。从抗争的发生来看,虽然有少数社会抗争是由“气场”或者情绪宣泄的需要所引起的(应星,2009),但大多数社会抗争的根源都在于利益冲突。不过对于不同的抗争群体,这种利益冲突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却是

不一样的,这也使得研究者们观察的角度有所不同(沈原,2006;熊易寒,2012)。

一旦社会抗争发生,什么样的抗争更可能成功呢?大多数经验研究所参考的理论都是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具体就是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框架建构理论。简单而言,这些理论大体上也是从结构与行动过程两个维度来探讨社会抗争的结果。首先,在中国,社会抗争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质疑,与之相应的是“维稳政治”的不断强化(冯仕政,2015)。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抗争能否避免国家干预或者争取国家支持,对其抗争诉求的满足有着很大影响(黄荣贵等,2015)。一般而言,社会抗争的合法性空间与其抗争诉求、对象、方式有着明显联系,但如果为了争取合法性空间而自我限制,那么社会抗争的意义有时也会因此被削弱。这种矛盾被许多学者称为“合法性困境”(陈映芳,2006;刘子曦,2010)。

在政治机会结构限定的条件下,社会抗争的结果取决于抗争过程的运作,如资源动员、行动策略、话语塑造与框架建构等等(俞志元,2012;蔡禾等,2009)。一方面,合法抗争越来越成为社会抗争的主要行动策略,这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尤其适用于那些法律意识较强的中产阶层(应星,2007;汪建华,2013)。另一方面,社会抗争中的行动话语和框架能够帮助动员群众的参与,同时也能影响到公众对社会运动的支持。考虑到不同抗争群体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中,他们在塑造话语和整合框架时所借助的价值观和道德资源是不一样的(折晓叶,2008)。

(二) 分层与流动

社会分层与流动是社会学中最为传统、也是最为经典的研究领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近十年来国内基于全国性抽样的大型调查逐步兴起,像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等数据陆续向学界公开,带动了一波相关研究的出现。考虑到社会分层与流动的核心议题是社会不平等,下面本文从不平等的结构、不平等的形成以及不平等的变迁三个方面做一概要的评述。

1. 不平等的结构

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可以从阶级和等级两种不同的理论视角给予描

述。因为等级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收入、权力、职业声望的不平等,因此,大部分涉及理论视角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阶级范式的讨论上,阶级的概念已经不再局限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而是扩展到更为广泛的雇佣关系、统治关系,权力关系以及组织、技能、声望等资源,形成了当代阶级概念。近年来国内学者在当代阶级概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制度特点构建了多种社会阶级框架,但是,因为资料所限,其应用和验证都还存在很多挑战(林宗弘、吴晓刚,2010;李路路等,2012)。

基于这些等级或阶级的框架,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不平等结构呈现为倒丁字结构(李强,2005)或金字塔结构(刘欣,2007),也有学者认为已经形成了纺锤形结构(李春玲,2005)。考虑到这些形态的关键在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中产阶级成为主要议题之一,其中涉及了中国中产阶级的主观意识与文化惯习特征(吕大乐、刘硕,2010)、中国中产阶级的分类或测量(李路路、李升,2007)、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李强,2005)。尽管很多研究者并不具有理论上的自觉性,但中产阶级议题仍有等级/经济学分析和阶级分析之分。

2. 不平等的形成

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上述不平等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已有研究大体上存在三种视角。一是个体主义视角,认为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与生活机会取决于自己的能力与努力。二是结构主义视角,强调个人所在的结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资源与生活机会(李骏,2014)。三是社会网络视角,认为社会关系网中流动着各种信息与资源,高质量的社会关系或者社会资本有助于获得更多社会资源和生活机会(梁玉成,2010;陈云松等,2014)。三种视角并不相互对立,而是共同解释了社会不平等的形成,而且不同的解释机制之间往往也存在着相互作用(吴愈晓,2011)。目前国内不平等研究除了关注阶层不平等以外,还重点讨论了户籍与性别不平等,而这些不平等形成的场域主要存在于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中。

由于“教育”对于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的中介作用在经济改革之后越来越重要,因此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大量研究认为,首先,家庭背景在每个教育阶段都能对子女升学产生影响,具体来说,家庭既可以通过文化再生产机制或者资源转化机制影响子女的学习成绩进而影响他们的升学机会(李煜,2006;洪岩壁、赵延东,2014),也可以通过理性选择机制直接影响子女的教育

育选择(王进、汪宁宁,2013;侯利明,2015)。其次,在各个教育阶段,家庭背景都会影响子女升学,因此其累积影响一直在上升(吴愈晓,2013)。不过家庭背景在特定教育阶段的影响会随着入学阶段的提升而有所下降,这是因为学生的同质性因为教育分流而越来越高,而且学生对家长的依赖也随着教育阶段提升而下降(唐俊超,2015)。

对于户籍和性别而言,大家更关心的是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平等,尤其是城市工人与农民工、男性与女性的收入差异。总的来说,这两种收入差异的形成是相似的,均是由人力资本差异和社会歧视造成的。首先,由于人力资本有限以及受社会歧视影响,农民工和女性难以进入资源和福利丰富的劳动部门,如农民工难以进入社会福利更高的垄断部门和国有部门(田丰,2010;李骏、顾燕峰,2011),而女性则更可能从事待遇差的“女性化”职业(吴愈晓、吴晓刚,2009)。其次,在各部门内,城市工人与农民工的收入差异主要是由人力资本差异引起的,“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比较少见(谢桂华,2007;田丰,2010)。与之相反,在同一部门内,至少有部分性别收入差异来源于社会歧视,但何种部门中的性别歧视更强却有争议(王天夫等,2008;吴愈晓、吴晓刚,2009)。最后,由于农民工、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使用社会关系网来求职(吴愈晓,2011),但其效果则与社会关系网的质量有关系(张春泥、刘林平,2008;张文宏、刘琳,2013)。

3. 不平等的变迁

社会不平等的形成不仅是个人与家庭行动的结果,这一过程同时嵌入在宏观社会经济环境之中。随着宏观环境的变迁,社会不平等也可能发生变化。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最重要的环境变迁就是国家主导的渐进式经济改革,这包括两个方面内容: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化)与经济结构的升级(工业化)。

(1)围绕有关“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国内研究大体上包括三方面内容。

第一,不同资本回报的变化。首先,所有研究几乎都发现教育收益率有所上升,但这种变化不完全是由市场化带来的,因为许多学者同时发现国有部门的教育收益率甚至高于非国有部门(刘精明,2006)。其次,求职时使用社会关系的收入回报也在市场化过程中有所提高(张顺、程诚,2011),但只有流动着信息资源的弱关系的收入回报逐渐增强,而蕴藏人情资源的强关系的收入回报则在减弱(边燕杰等,2012)。

最后,尽管上述与经济绩效联系更密切的资本形式对于人们收入获得的影响在逐渐上升(陈光金,2010),但也有研究显示政治资本回报并未因此出现下降,反而同步上升(梁玉成,2007)。

第二是关于精英流动的研究,其核心问题是:在市场化过程中,精英流动模式是否会变化,从精英再生产模式转向精英循环模式?首先,代内精英流动讨论的是新兴市场精英是来源于原再分配精英还是一般社会成员?现有研究发现,原再分配干部在转变为新兴市场精英时仍然具有较大优势(吴晓刚,2006)。其次,代际精英流动讨论的是精英子女能否继承其父母的精英地位?一方面,市场转型并没有改变代际流动的基本模式,即代际再生产模式,但代际再生产的机制则发生了重要改变,“教育”的中介作用越来越重要(李路路,2003)。另一方面,研究显示,农村的精英分化更为明显,改革前权力精英子女更可能成为权力精英,建国前的经济精英子女更可能成为经济精英(吴愈晓,2010);但城市精英之间已经相互渗透,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郑辉、李路路,2009)。

第三,虽然市场化可能会提高个人能力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作用,但同时也可能会增强社会歧视,从而扩大社会不平等,这一点在性别收入不平等上体现得尤其明显。许多研究表明,性别收入差距在过去几十年一直稳步扩大,特别是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工作部门和地区,这主要是因为国家意识形态保护在这些部门与地区迅速退出,导致性别歧视强化(王天夫等,2008;贺光烨、吴晓刚,2015)。

(2)上述研究的背景都是市场转型,与市场化同步进行的则是工业化,工业化引起了产业结构升级和教育扩张,从而扩大了人们的机会结构,但这些增加的机会是否在各社会群体中随机分配呢?目前研究集中于教育机会扩张与教育获得不平等的关系,结果表明,教育扩张并没有改变基于家庭阶级背景的教育不平等,反而扩大了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李春玲,2010,2014)。尽管有研究表明教育扩张过程中性别不平等趋于下降(张兆曙、陈奇,2013),但这究竟是教育扩张的结果还是生育率下降或者其他社会过程引起的(叶华、吴晓刚,2011),尚需要进一步讨论。

(三)家庭与生活

上面两个部分分别回顾了以组织和群体为中心的宏大社会结构,

这一部分则转向具体的日常生活,这不仅是因为日常生活与个体联系更密切,而且其同样能够反映社会秩序与社会变迁。

1. 婚姻与家庭

关于婚姻与家庭的社会学研究,在上世纪80-90年代曾是非常热门的研究领域,但从90年代中叶以后则逐渐减少,直到最近几年,相关研究又开始活跃。这些研究将家庭现代化理论作为理论对话焦点,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家庭组织的生命历程,包括家庭的形成(结婚)与解体(离婚);二是家庭组织的结构与内部关系。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中国经验研究的挑战。

首先,现有研究显示,社会经济以及家庭背景因素在婚姻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在婚姻市场中的影响愈加重要,尤其是对于男性而言(於嘉、谢宇,2013);与之相类似,离婚成本越高,离婚可能性也越低,例如有孩子就对婚姻稳定具有保护作用(许琪等,2013)。另一方面,从婚姻匹配的角度来看,“同类婚”一直都是我国婚姻匹配的主要模式。六十年来,自致性因素(配偶双方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先赋性因素(家庭背景)匹配程度呈现上升趋势(李煜,2011;齐亚强、牛建林,2012)。

其次,利用国内多次家庭变迁调查以及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发现,虽然中国家庭规模呈小型化趋势,但家庭结构“核心化”则有待商榷。核心家庭其实一直是我国最普遍的家庭类型,而且核心家庭比例在90年代初经过短暂的提升之后开始下降,这主要是因为标准核心家庭比例大幅下降;与此同时,核心家庭中的夫妇家庭、单身家庭、隔代家庭的比例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马春华等,2011;王跃生,2013;胡湛、彭希哲,2014)。

一些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家庭中,夫妻轴正取代亲子轴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这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子女婚姻自主性的增强,二是家庭结构核心化将导致代际之间的社会支持趋于下降(张友琴,2002)。但更多学者认为,夫妻关系越来越重要,并不意味着亲子轴就会被取代。尽管已婚子女与父母同居的比例在下降,但绝大多数人仍然与父母居住在同一城市(马春华等,2011),而且许多父母会跟随子女迁移到对方城市(吴要武,2013)。更重要的是,代际之间在经济支持、日常照料、情感慰藉等方面存在着密切的互动(杨菊华、李路路,2009)。

2. 社会资本

一般而言,社会资本可以理解为社会关系网中所蕴含的资源。根据社会关系网所依附的主体,可以将社会资本分为个体层次和集体层次两种(赵延东、罗家德,2005)。

就个体社会资本而言,研究者们主要关心两个问题:一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总体而言,精英阶层拥有较高的社会资本,体现为网络规模更大、网络异质性更强、网顶更高等(张文宏,2005)。第二个问题是社会支持网的变化。研究发现,现代化使得人们的社会支持网更加多元化,虽然亲属依然是财务支持的主要来源,但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向同事、朋友寻求精神上的支持(张文宏、阮丹青,1999)。对于老年人来说,家庭则是社会支持最重要的来源,但随着“空巢家庭”日益增多,社区网络提供的社会支持越来越重要(张友琴,2001,2002)。

集体社会资本中受到更多关注的是社会信任,特别是普遍信任。早期研究认为,考虑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的信任是关系取向的,与自己关系越近信任度越高,因此普遍信任较低(王飞雪、山案俊男,1999)。但进一步的分析则显示,中国的普遍信任并不低,原因可能有二:一方面,儒家文化中也存在促进普遍信任形成的积极因素(胡安宁、周怡,2013);另一方面,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因此较强的特殊信任并不会抑制普遍信任,后者的形成更可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李伟民、梁玉成,2002)。

除了对普遍信任感兴趣以外,还有大量研究关心政治信任。这些研究的一个基本发现是,人们的政府信任随着政府级别升高而升高,而且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总体上低于农村居民(高学德、翟学伟,2013),不过目前对此还没有系统解释。已有研究大体上是从两种视角来分析政治信任形成的:一是理性主义视角,即政府绩效越高人们的政治信任越高(高学德、翟学伟,2013;胡荣等,2011);二是社会资本视角,该视角认为社会信任与政治参与有助于提高政府信任,但经验研究也发现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的影响不一致甚至相反(高勇,2014;胡荣,2015)。

3. 社会态度

阶层认同与公平感对于集体行动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受到许多关注。事实上,已有研究提出的二者的形成机制非常类似,主要包括结构决定论和相对剥夺感理论。结构决定论强调,人们的阶层认同

是由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那些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是当前分配过程中的获益者,故而倾向于认为当前的分配状况是公平的(孙明,2009)。相对剥夺感理论则强调,人们的主观认同与公平感不是由客观阶层地位所决定的,而是更多地来自于社会比较所产生的相对剥夺感,这种比较的对象可能是周围“参照群体”,也可能是自己过去的生活机遇。相对剥夺感越高,人们的阶层认同和公平感就越低(刘欣,2002;范晓光、陈云松,2015;怀默霆,2009;马磊、刘欣,2010)。

生活质量的内容包括很多,幸福感或者生活满意度通常被用来描述个人对于自己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我国社会学者对此的研究起步较早,上世纪80年代,林南等人通过天津千户调查发现,影响人们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集中在工作、家庭和环境三个方面(林南等,1987),后续研究仍然是围绕这些方面展开的。首先,幸福感研究的“伊斯特林悖论”一直是争论的中心,有研究发现,中国人的整体幸福感随着经济发展而增长(刘军强等,2012),同时也有研究认为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与人们的幸福感没有关系(邢占军,2011)。其次,许多学者认为,婚姻对于人们的幸福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吴愈晓等,2015)。但是孩子数量与质量的影响则有争议,有研究认为孩子更多能够增加父母幸福感(穆峥、谢宇,2014),其他研究则指出,如果孩子的质量不能保证,那么更多孩子只能给父母带来更大压力,从而降低他们的幸福感(石智雷,2015)。除了幸福感以外,越来越多的研究涉及到具体生活质量内容,包括健康、消费、住房、环境等等,这里不一一展开。

三、现有问题

在即将结束之前,本文想对经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做一简要评论。毋庸讳言,中国社会学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依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这里仅举几点供学界讨论。

首先,就研究议题与研究内容来看,存在明显的虹吸效应,目前大多数研究都集中于几个传统研究领域,如社会分层与流动、组织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等。随着大量研究聚焦于同一个议题,一个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内卷化,这里的内卷化可以理解成:在难以突破既有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框架的条件下,经验研究内容越来越精细。例

如,一些定量研究脱离了重要的问题意识,理论的援引与演绎有时只是从数据统计结果反推而来,而数据统计结果更像是多个变量之间的排列组合。这种内卷化的发展使得社会学研究难以回应目前真正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更不用说对社会变迁趋势的准确预测以及推动相应社会政策的制定。中国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发展时间相对还不长,整体内卷化程度可能并不高,但需要警惕一些领域中较为明显的内卷化现象;更重要的则是急需开拓与当代中国社会密切关联的研究领域,如城市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法律社会学、金融社会学、医疗社会学等等。

其次,虽然经验研究的新领域开拓远远不够,但却有相当多的经验研究缺少对经典理论或既有理论的概念、假设、命题以及使用边界的深刻理解,沉溺于创造“新概念”、“新理论”。这些经验研究的积累带来的一个结果是:经验材料与理论发展的双重碎片化。具体说,经验材料不能通过理论来整合,而大量的“新概念”、“新理论”由于缺乏内在逻辑关系同样难以系统化。例如,在对基层政权的研究中,无论是政府形式还是政府非正式行为,都出现了大量概念,前者像“压力型体制”、“谋利型政权经营者”、“汲取型政权”、“悬浮型政权”、“协调型政权”、“维控型政权”、“依附型政权”等等;后者像“变通”、“倒逼”、“共谋”、“非正式政治”、“关系运作”等等。这些概念固然能够揭示基层政权的某些特征,但随着这些概念的增多,每个概念本身的意义、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则需要更多讨论。

内卷化与碎片化本来是两种方向不同的发展趋势,前者受限于既有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框架,后者则缺少相应的继承与积累,但这两种相悖现象确实都出现在中国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中。这两种问题的存在,使得我们难以形成一个关于中国社会的全景式图像。针对此,本文想强调,随着研究者越来越关注“为什么”,“是什么”应该得到更多重视而不是被忽视。“为什么”的基础在于“是什么”,如果不能准确地“描述”,那么“解释”可能就是南辕北辙,在一个处于急剧变迁的社会中更是如此。

最后,从第一部分的内容可以看到,研究方法的应用在这三十年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不过也存在许多可以改善的地方。其一,经验材料还可以继续拓展,这既包括拓展定量研究的数据来源,如网络数据、统计年鉴、历史文献数据以及多种数据的匹配使用;同时也包括丰富定性研究的材料,如文书档案、影视图像、器物衣裳等。其二,正如上文所说,

目前定量研究已经比较规范,大多数论文都对研究方法做了具体介绍,但是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的规范性还有待加强。其三,正如近年来一些学者所强调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应该努力走向开源的社会学,尤其对定量研究而言需要倡导“复制性研究”(陈云松、吴晓刚,2012),一个重要目的在于确保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事实上,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加可信,研究者自己应在文章中有意识地做一些稳健性检验。

上述问题有的不限于中国,有的在中国比较突出。对于此,固然需要我们研究人员的自觉努力,同时也需要包括《社会学研究》在内的所有专业杂志采取一些措施予以推动。这里提出一些思路仅供参考:第一,在现有论文发表程序下,文章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匿名审稿专家的态度与水平,为了进一步提高同行评议水平,或许可以在审稿流程结束之后以适当方式公开评审意见。第二,在现有科研评价体系中,专业期刊尤其是权威期刊对于专业发展方向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因此为了支持新兴研究领域的发展,学术期刊可以通过专题方式重点推介相关研究成果的发表与学术对话。第三,为了促进开源性的社会学,学术期刊应该鼓励作者在文章中或者附录中详细说明研究方法,并且公开程序文件乃至研究材料,与此同时,学术期刊还可以采用增刊或者副刊形式刊登复制性研究以供交流与讨论。

参考文献:

- 边燕杰、张磊,2006,《网络脱生:创业过程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 边燕杰、张文宏、程诚,2012,《求职过程的社会网络模型:检验关系效应假设》,《社会》第3期。
- 蔡禾、李超海、冯建华,2009,《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研究——基于珠三角企业的调查》,《社会学研究》第1期。
- 曹正汉,2008,《产权的社会建构逻辑——从博弈论的观点评中国社会学家的产权研究》,《社会学研究》第1期。
- 曹正汉、史晋川,2009,《中国地方政府应对市场化改革的策略:抓住经济发展的主动权——理论假说与案例研究》,《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曹正汉、薛斌锋、周杰,2014,《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社会学研究》第3期。
- 曹正汉、周杰,2013,《社会风险与地方分权——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实行地方分级管理的原因》,《社会学研究》第1期。
- 陈光金,2010,《市场抑或非市场:中国收入不平等成因实证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 陈家建,2013,《项目制与基层政府动员——对社会管理项目化运作的社会学考察》,《中国社

会科学》第2期。

陈家建、边慧敏、邓湘树,2013,《科层结构与政策执行》,《社会学研究》第6期。

陈映芳,2006,《行动力与制度限制:都市运动中的中产阶级》,《社会学研究》第4期。

陈云松、比蒂·沃克尔、亨克·弗莱普,2014,《“关系人”没用吗?——社会资本求职效应的论战与新证》,《社会学研究》第3期。

陈云松、吴晓刚,2012,《走向开源的社会学》,《社会》第3期。

邓燕华、阮横俯,2008,《农村银色力量何以可能?——以浙江老年协会为例》,《社会学研究》第6期。

狄金华,2015,《政策性负担、信息督查与逆向软预算约束——对项目运作中地方政府组织行为的一个解释》,《社会学研究》第6期。

董磊明,2002,《传统与嬗变——集体企业改制后的苏南农村村级治理》,《社会学研究》第1期。

范晓光、陈云松,2015,《中国城乡居民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社会学研究》第4期。

冯猛,2014,《基层政府与地方产业选择——基于四东县的调查》,《社会学研究》第2期。

冯仕政,2015,《社会冲突、国家治理与“群体性事件”概念的演生》,《社会学研究》第5期。

符平,2011,《次生庇护的交易模式、商业观与市场发展——惠镇石灰市场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

高学德、翟学伟,2013,《政府信任的城乡比较》,《社会学研究》第2期。

高勇,2014,《参与行为与政府信任的关系模式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

耿敬、姚华,2011,《行政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以上海市J居委会直选过程为个案》,《社会学研究》第3期。

耿曙、陈玮,2015,《政企关系、双向寻租与中国的外资奇迹》,《社会学研究》第5期。

贺光烨、吴晓刚,2015,《市场化,经济发展与中国城市中的性别收入不平等》,《社会学研究》第1期。

洪岩壁、赵延东,2014,《从资本到惯习:中国城市家庭教育模式的阶层分化》,《社会学研究》第4期。

侯利明,2015,《地位下降回避还是学历下降回避——教育不平等生成机制再探讨(1978-2006)》,《社会学研究》第2期。

胡安宁、周怡,2013,《再议儒家文化对一般信任的负效应——一项基于2007年中国居民调查数据的考察》,《社会学研究》第2期。

胡荣,2015,《中国人的政治效能感、政治参与和警察信任》,《社会学研究》第1期。

胡荣、胡康、温莹莹,2011,《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社会学研究》第1期。

胡湛、彭希哲,2014,《中国当代家庭户变动的趋势分析——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考察》,《社会学研究》第3期。

怀默霆,2009,《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社会学研究》第1期。

黄荣贵、郑雯、桂勇,2015,《多渠道强干预、框架与抗争结果——对40个拆迁抗争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社会学研究》第5期。

黄晓春、嵇欣,2014,《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

《社会学研究》第6期。

江华、张建民、周莹,2011,《利益契合: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分析框架——以行业组织政策参与为案例》,《社会学研究》第3期。

李春玲,2005,《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社会学研究》第2期。

——,2010,《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社会学研究》第3期。

——,2014,《教育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1940-2010)——对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再考察》,《社会学研究》第2期。

李骏,2014,《组织规模与收入差异——1996-2006年的中国城镇社会》,《社会学研究》第5期。

李骏、顾燕峰,2011,《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分层》,《社会学研究》第2期。

李路路,2003,《制度转型与阶层化机制的变迁——从“间接再生产”到“间接与直接再生产”并存》,《社会学研究》第5期。

李路路、李升,2007,《“殊途异类”:当代中国城镇中产阶级的类型化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李路路、秦广强、陈建伟,2012,《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基于工作状况和组织权威的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李路路、朱斌,2014,《家族涉入、企业规模与民营企业的绩效》,《社会学研究》第2期。

李培林、梁栋,2003,《网络化:企业组织变化的新趋势——北京中关村200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调查》,《社会学研究》第2期。

李强,2005,《“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第2期。

李伟民、梁玉成,2002,《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社会学研究》第3期。

李煜,2006,《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2011,《婚姻匹配的变迁:社会开放性的视角》,《社会学研究》第4期。

李芝兰、吴理财,2005,《“倒逼”还是“反倒逼”——农村税费改革前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社会学研究》第4期。

梁玉成,2007,《现代化转型与市场转型混合效应的分解》,《社会学研究》第3期。

——,2010,《社会资本和社会网无用吗?》,《社会学研究》第5期。

林南、王玲、潘允康、袁国华,1987,《生活质量的结构与指标——1985年天津千户户卷调查资料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林宗弘、吴晓刚,2010,《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社会学研究》第6期。

刘长喜、孟辰、桂勇,2014,《政府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社会学分析——一个能力论的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第3期。

刘成斌,2014,《活力释放与秩序规制——浙江义乌市场治理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第6期。

社会学研究

- 刘精明,2006,《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与人力资本收益》,《社会学研究》第6期。
- 刘军强、熊谋林、苏阳,2012,《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 刘平、王汉生、张笑会,2008,《变动的单位制与体制内的分化——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为例》,《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刘欣,2002,《相对剥夺地位与阶层认知》,《社会学研究》第1期。
- ,2007,《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社会学研究》第6期。
- 刘子曦,2010,《激励与扩展: B市业主维权运动中的法律与社会关系》,《社会学研究》第5期。
- 吕大乐、刘硕,2010,《中产小区: 阶级构成与道德秩序的建立》,《社会学研究》第6期。
- 马春华、石金群、李银河、王震宇、唐灿,2011,《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社会学研究》第2期。
- 马磊、刘欣,2010,《中国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
- 穆峥、谢宇,2014,《生育对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社会学研究》第6期。
- 齐亚强、牛建林,2012,《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婚姻匹配模式的变迁》,《社会学研究》第1期。
- 邱泽奇,1999,《乡镇企业改制与地方威权主义的终结》,《社会学研究》第3期。
- 渠敬东,2015,《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国近世变迁及经史研究的新传统》,《社会》第1期。
-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沈原,2006,《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第2期。
- 石发勇,2010,《业主委员会、准派系政治与基层治理——以一个上海街区为例》,《社会学研究》第3期。
- 石智雷,2015,《多子未必多福——生育决策、家庭养老与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社会学研究》第5期。
- 孙明,2009,《市场转型与民众的分配公平观》,《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孙秀林,2008,《村庄民主及其影响因素: 一项基于400个村庄的实证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 唐俊超,2015,《输在起跑线——再议中国的教育不平等(1978-2008)》,《社会学研究》第3期。
- 田丰,2010,《城市工人与农民工的收入差距研究》,《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汪建华,2013,《实用主义团结——基于珠三角新工人集体行动案例的分析》,《社会学研究》第1期。
- 王飞雪、山岸俊男,1999,《信任的中、日、美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第2期。
- 王汉生、王一鸽,2009,《目标管理责任制: 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社会学研究》第2期。
- 王汉生、吴莹,2011,《基层社会中“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国家——发生在一个商品房小区中的几个“故事”》,《社会学研究》第1期。
- 王进、汪宁宁,2013,《教育选择: 理性还是文化——基于广州市的实证调查》,《社会学研究》第3期。
- 王天夫、赖扬恩、李博柏,2008,《城市性别收入差异及其演变: 1995-2003》,《社会学研究》第

2期。

- 王星,2012,《利益分化与居民参与——转型期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困境及其理论转向》,《社会学研究》第3期。
- 王跃生,2013,《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 吴宝、李正卫、杜仁勇,2011,《社会资本、融资结网与企业间风险传染——浙江案例研究》,《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吴晓刚,2006,《“下海”: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转型中的自雇活动与社会分层(1978-1996)》,《社会学研究》第6期。
- 吴要武,2013,《独生子女政策与老年人迁移》,《社会学研究》第4期。
- 吴愈晓,2010,《家庭背景、体制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1978-1996)》,《社会学研究》第2期。
- ,2011,《社会关系、初职获得方式与职业流动》,《社会学研究》第5期。
- ,2013,《教育分流体制与中国的教育分层(1978-2008)》,《社会学研究》第4期。
- 吴愈晓、王鹏、黄超,2015,《家庭庇护、体制庇护与工作家庭冲突——中国城镇女性的就业状态与主观幸福感》,《社会学研究》第6期。
- 吴愈晓、吴晓刚,2009,《城镇的职业性别隔离与收入分层》,《社会学研究》第4期。
- 肖瑛,2014,《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中国社会科学报》6月27日。
- 谢桂华,2007,《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市场》,《社会学研究》第5期。
- 邢占军,2011,《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社会学研究》第1期。
- 熊万胜,2010,《基层自主性何以可能——关于乡村集体企业兴衰现象的制度分析》,《社会学研究》第3期。
- 熊易寒,2012,《从业主福利到公民权利——一个中产阶层移民社区的政治参与》,《社会学研究》第6期。
- 许琪、于健宁、邱泽奇,2013,《子女因素对离婚风险的影响》,《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杨典,2011,《国家、资本市场与多元化战略在中国的兴衰——一个新制度主义的公司战略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第6期。
- 杨菊华、李路路,2009,《代际互动与家庭凝聚力——东亚国家和地区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第3期。
- 杨敏,2007,《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第4期。
- 叶华、吴晓刚,2011,《生育率下降与中国男女教育的平等化趋势》,《社会学研究》第5期。
- 应星,2007,《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第2期。
- ,2009,《“气场”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两个个案的比较》,《社会学研究》第6期。
- 於嘉、谢宇,2013,《社会变迁与初婚影响因素的变化》,《社会学研究》第4期。
- 俞志元,2012,《集体性抗争行动结果的影响因素——一项基于三个集体性抗争行动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张春泥、刘林平,2008,《网络的差异性和求职效果——农民工利用关系求职的效果研究》,

《社会学研究》第4期。

张顺,程诚,2012,《市场化改革与社会网络资本的收入效应》,《社会学研究》第1期。

张文宏,2005,《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本的阶层差异》,《社会学研究》第4期。

张文宏、刘琳,2013,《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研究——一种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社会学研究》第5期。

张文宏、阮丹青,1999,《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社会学研究》第3期。

张友琴,2001,《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城乡比较研究——厦门市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第4期。

——,2002,《城市化与农村老年人的家庭支持》,《社会学研究》第5期。

张兆曙、陈奇,2013,《高校扩招与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化——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的实证分析》,《社会学研究》第2期。

赵延东、罗家德,2005,《如何测量社会资本:一个经验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第2期。

折晓叶,2008,《合作与非对抗性抵制——弱者的“韧武器”》,《社会学研究》第3期。

折晓叶、陈婴婴,2005,《产权怎样界定——一份集体产权私化的社会文本》,《社会学研究》第4期。

——,2011,《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郑辉、李路路,2009,《中国城市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社会学研究》第6期。

周飞舟,2006a,《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2006b,《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社会学研究》第3期。

——,2007,《生财有道:土地开发和转让中的政府和农民》,《社会学研究》第1期。

——,2009,《锦标赛体制》,《社会学研究》第3期。

周雪光,2008,《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社会学研究》第6期。

——,2009,《一叶知秋:从一个乡镇的村庄选举看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社会》第3期。

周雪光、艾云,2010,《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周雪光、练宏,2012,《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第5期。

周雪光、赵伟,2009,《英文文献中的中国组织现象研究》,《社会学研究》第6期。

朱秋霞,1998,《网络家庭与乡村私人企业的发展》,《社会学研究》第1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李路路)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朱斌)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李才香)

责任编辑:杨典